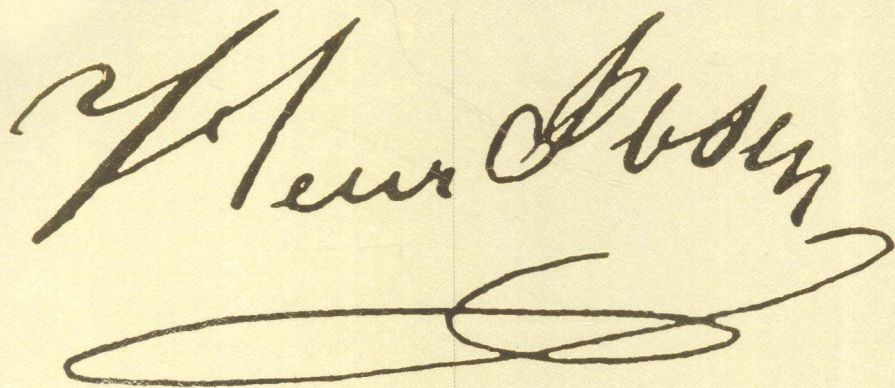


易卜生书信演讲集

A large, elegant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dark ink, reading 'Henrik Ibsen'. The signature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with a prominent, sweeping underline that loops around the bottom of the name.

〔挪威〕易卜生 著
汪余礼 戴丹妮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易卜生书信演讲集

〔挪威〕易卜生 著
汪余礼 戴丹妮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0-3615

本书根据 *Letters of Henrik Ibsen (Translated by John Nilsen Laurvik and Mary Morrison, New York; The Premier Press, 1908)* 和 *Speeches and New Letters of Henrik Ibsen (Translated by Arne Kildal, Boston; The Borham Press, 1910)* 译出,并参照 Ibsen's *Letters and Speeches (Edited by Evert Sprinchorn)* 校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易卜生书信演讲集/(挪)易卜生著;汪余礼,戴丹妮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8335-0

I. ①易… II. ①易…②汪… ③戴… III. ①易卜生, H. J. (1828 ~ 1906) — 书信集②易卜生, H. J. (1828 ~ 1906) — 演讲—文集 IV. ①K835.33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4134 号

责任编辑 张福生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63 千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4.75 插页 5

版 次 2012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02-008335-0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N O R L A

挪威对外文学促进会
资助出版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1YJC752020）成果



作者像

序

武汉大学艺术学系教师汪余礼和武汉大学外语学院英语专业教师戴丹妮合译的《易卜生书信演讲集》，策划、逐译、成书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之末，现在摆在读者面前了。这是一部适应时代需求、有助于推进我国易卜生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的优秀译著，颇具启迪深思作用和学术引导意义。

我和两位译者相识已久，他们对文学创作和美学理论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汪余礼与我可说是“忘年之交”。他勤奋踏实，锐意求新，在我所熟悉的年轻“学人”中显得相当突出。他在中央戏剧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努力研究易卜生及其戏剧，在谭霈生教授指导下完成了颇具创见深意的博士论文《易卜生晚期戏剧新论》。前年他进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在易卜生研究领域又取得了新的进展。这部译著的另一译者戴丹妮外语功底厚实，域外信息灵通，与汪余礼共译此书，可谓“相得益彰”。

《易卜生书信演讲集》有什么重要而突出的特色与功能呢？我意图从三个紧密联系的方面予以解说，并重在揭示它对于戏剧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的导引辐射作用。

一、版本信实可靠，中挪学界支持。《易卜生书信演讲集》主要依据的两个最可靠而较周全的版本，系由挪威奥斯陆大学易卜生研究中心前主任克努特·布莱恩·希尔德斯瓦尔教授所提供，即英译本 *Letters of Henrik Ibsen* (1908) 和 *Speeches and New Letters of Henrik Ibsen* (1910)；此外参校的其他版本，也是学界公认较好的版本。此书在策划、翻译、修改、成书过程中，曾获挪威驻华大使

馆、挪威对外文学促进会以及中挪易卜生研究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热切关怀(见“译后记”),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它确实是适应时代和学界的需要而产生的。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此书问世的“契机”,显然受惠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8卷本《易卜生文集》、1997年出版的《易卜生戏剧选》的启示,以及中国文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易卜生研究论文集》的促进。据笔者所知,挪威奥斯陆大学易卜生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非常重视图书馆珍藏的中文版8卷本《易卜生文集》。可以预测,该“中心”和挪威学界也会热烈欢迎与此“文集”呼应配套的《易卜生书信演讲集》。毋庸讳言,这也是中国广大读者、学术界盼望已久的佳作。

二、结构模式精当,内容丰富多样。该书分为三个部分:(一)易卜生在挪威和国外各地的“书信”(1844—1901);(二)易卜生在国内外各地的“演讲”(1865—1898);(三)易卜生写的回忆、序言、札记等(1867—1898)。这三个部分均有翔实独到的注解诠释,并附有一些珍贵难觅的图片。其中“书信”部分,显然是全书的“重中之重”。从易卜生在挪威的青少年时期(1828—1844—1863),经过在罗马流亡旅居时期(1864—1868,1881—1885),在德累斯顿流亡旅居时期(1868—1875),在慕尼黑流亡旅居时期(1875—1880,1885—1891),到返回挪威时期(1891—1906),共收入书信285件。众多的书信依据易卜生在各处生活创作的历史进程,以及嬗变演化的时序予以艺术安排。各个“乐章”纵向与横向有机结合,形成了令人神往而极富魅力的“交响乐”。

在这里,关于易卜生生活历程与编剧经验的纪实资料,充实而弥可珍贵。比如,在挪威格里姆斯塔当药剂师莱曼的学徒时,易卜生致保尔·莱恩的信(1844.5.20)讲述了最初作诗、编剧的情景。又比如,在戏剧《苏尔豪格的宴会》首演不久,易卜生在卑尔根玛格琳德·托雷森家里第一次与苏珊娜·托雷森会晤(1856.1.7),

一见倾心,写下了优美的诗歌《致我的唯一》,并于同年与之订婚;1858年6月18日,两人终成眷属。如此诗体书信,可与英国诗人乔治·戈登·拜伦的抒情诗《雅典的少女》媲美,爱恋之情与追求和谐自由世界的形象合一。在众多书信中,无论是致亲人(妻子、岳母、儿子、妹妹等),致友人(汉森、勃兰兑斯、比昂松、约纳斯等),致挪威政府、出版商、剧院编导(国王、海格尔、安德烈森、劳比等),还是致其他方面的人士(如阿契尔、葛斯、霍夫瑞等),谈得最多的是文艺思维活动,以及诗歌与戏剧的创作实践。这里以戏剧创作为证,并予以简释。自保存至今易卜生最早的书信(致保尔·莱恩)提及写诗编剧之后,易卜生在书信中连续不断地议论自己的文艺创作活动,从策划到成品产生。在青年时代,论及的剧作就有诗剧《凯蒂琳》,随后议论的剧作还有《爱的喜剧》、《觊觎王位的人》、《苏尔豪格的宴会》、《奥拉夫·里列克兰斯》、《厄斯特罗特的英格夫人》、《海尔格伦的海盗》,等等。在罗马时期,议论的剧作主要有诗剧《布朗德》、《培尔·金特》等,以及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等。在德累斯顿和慕尼黑时期,议论的剧作主要有散文剧《社会支柱》、《青年同盟》、《皇帝与加利利人》等,以及晚期的《野鸭》、《罗斯莫庄》等象征性浓厚的剧作。在返回挪威后,除了继续谈论早期和中期剧作,重点议论《建筑大师》、《咱们死人醒来时》,易卜生与挪威小说家卡米拉·科莱特的书信来往尤为值得注意。科莱特在致易卜生的信中说,她自己就是“海上夫人”(艾梨达)这一人物的原型;易卜生在回信中说:“伴随着你的精神和智力的发展,多年来你经常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我的作品中扮演某个角色。”此言精当,讲透了典型塑造与原型提升之间的关系。

由是观之,易卜生的这些书信实际上已成为诗人、剧作家创作生涯的“实录”。这里既有自评己作,又不乏与人关于文学创作的研讨和争议。如将这些书信中的文评与有关方面结合起来,上述

特色则更加鲜明。话说到此,切勿忘却书信下面“注释”的奥妙:它们不仅对正文具有导引、释义的作用,而且颇有引导读者深入思考的功能。试举三例证之。其一,1866年6月9日“致弗雷德里克·海格尔”,在注③中简介了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不仅影响了易卜生的诗剧《布朗德》,甚至是充满现实“人性”的“易卜生主义”形成的重要“基因”;与此相关,1871年2月17日“致乔治·勃兰兑斯”,在注①中讲解这位丹麦文学批评家于1871年12月20日致易卜生的信中附有一首诗,表示他“决心参加由易卜生领导的精神革命”。这无疑对读者认识“易卜生主义”很有助益。其二,1868年10月31日“致弗雷德里克·海格尔”,在注①中讲述易卜生一家生活史迹后,估测剧作家开始写作《青年同盟》或许是受了比昂松的影响,他发现这部散文剧“比大型诗剧还要难写”,此处注释的参考价值较大。其三,易卜生在书信中多次讲解《玩偶之家》写作、出版、演出的情况及其在国际剧坛的影响。1879年9月15日“致弗雷德里克·海格尔”的注①和注②,对此作了简要的阐释。如将这里的注解和有关书信(“致丹麦《国家公报》一个编辑”)、讲演(“在挪威妇女保护协会一个宴会上的讲话”)、札记(“《玩偶之家》创作札记”)对照通读,不仅对于“娜拉出走”这一类问题的历史、现实与未来有深切的理解,而且可能引导人们去探究诗人、戏剧家毕生通过文艺所倡导的“精神的冲突——个性的叛逆——自由与解放”。

三、多维视野宏阔,文艺理论深邃。前文已经提及,现在深入阐述。易卜生在书信、演讲、回忆、序言和札记中,不仅记叙自己的生活与创作,而且评议他人的作为与著述;不仅抒发他的诗学之思,而且表达他的哲理审美观。易卜生在早、中、晚三期所创作的多种多样的作品中蕴含着多重文学代码,比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的代码,都可能在这里发掘其因缘关系。

在 1867 年 12 月 28 日致比昂松的信中,易卜生结合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里的女巫、歌德诗剧《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里的葛兹,驳斥了克莱门·彼得森对诗剧《培尔·金特》的误解,兼劝友人到国外去,“拓展个人的视野”。在较多书信中,易卜生议论了西方文化巨人和北欧文化巨人的丰功伟绩。在 1891 年 10 月 25 日“致勃兰兑斯”中,易卜生衷心祝贺这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为人类的精神自由事业所做的 25 年先驱性的工作”,如此赞扬是真挚而切实的。这些文化巨人,无论来自何处,他们对挪威民族文学繁荣的积极促进作用已是不争的史实。

易卜生一部分书信中多次论及《野鸭》,这对我们理解剧作家的艺术人生很重要。他在致弗雷德里克·海格尔的信中提到《野鸭》“很可能会把我们中间一些年轻剧作家引上一条新的创作道路”,这里的“新道路”所指究竟为何,值得深思。他在另一封信中指出,《野鸭》翻译成他国文字的难度很大,准确地把握人物性格和主要情节“绝非易事”(1891 年 3 月 6 日“致维克特·巴茹坎德”)。依我之见,《野鸭》难译难解,除开文字隔膜还有多维视野互动、多元表现手法融合的“雾障”(难以透视)缘故。人们认同易卜生的创作“自白”：“我的任务一直是描写人类。……写作品的人和读作品的人都是诗人,他们是合作者。与诗人自身相比,读者有时更理想化,更富有诗意”(1898 年 5 月 26 日“在挪威妇女权利保护协会一个宴会上的讲话”)。事实如此,作为后期剧作之首的《野鸭》,无论它通过如何复杂的自审、辩驳形式表现多重思想意义,如能拨开浪漫的、象征的“迷雾”,就不难见出其针砭黑暗现实的功能:始终不渝地追求生活真理与人性自由。

如果把《童年的回忆》,关于《凯蒂琳》、《易卜生文集》的序言,关于《玩偶之家》、《海达·高布乐》的创作札记,以及众多书信,作为深入理解易卜生文学创作的“参照系”和“释义资料”,我们一定能够全面体悟易卜生 70 岁时的自我评审:“在这个真正的

受难周里,我的一生忽然变成了一个神奇的故事。我,一个老剧作家,看到自己的一生成了一首长诗,一首奇妙的长诗。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仲夏夜之梦。”(1898年4月13日“在斯德哥尔摩一个宴会上的讲话”)

综上所述,《易卜生书信演讲集》作为读解、研讨易卜生及其诗歌戏剧的“良师益友”,在当下对于中国易卜生研究与翻译,对于构建中国“易卜生学”,乃至对于北欧文学研究与翻译,具有重大的补缺功能与启示意义。译者态度严谨认真,对译稿作了多次修改,其译文忠实可靠,流畅可读,其所撰前言亦用力甚深,对全书具有积极的导读功效。祈望这本译作引起同行的评议,受到读者的欢迎。

王忠祥

2010年12月24日

译者前言

易卜生被引介到中国已有百年,对中国现代戏剧、文学与文化的影响至深至巨,可以说已经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真的已经充分理解易卜生了吗?他是否离我们看似很近而实际很远?这是近年来中国再度兴起“易卜生热”时一些学者提出的一个疑问。

带着这一疑问,我们细读了 *Letters of Henrik Ibsen* 和 *Speeches and New Letters of Henrik Ibsen*, 参阅了 *Letters and Speeches of Henrik Ibsen*, 并在挪威易卜生研究中心的 Knut Brynhildsvoll 教授和我国著名易卜生研究专家王忠祥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将其译成了中文,进而编成《易卜生书信演讲集》。编译完毕之后,我们觉得它对于了解易卜生的经历、性格、思想与创作,对于还原、发现一个“真实的易卜生”,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如果从学术上来考量,它尤其有助于中国学人重新思考易卜生的人生哲学、易卜生的艺术美学、易卜生的戏剧诗学、易卜生与北欧神话、易卜生与古希腊戏剧、易卜生与莎士比亚、易卜生与勃兰兑斯、易卜生与德国思想、易卜生与现代中国等一系列重要论题,也有助于深入探讨易卜生对于当下中国文学创作与文化建设的启示意义。对此译者不拟全面评述,而主要就翻译过程中特别关注的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与“易卜生主义”都紧密相关)谈点感想,以引起大家进一步思

考。

首先一个问题,是易卜生究竟持有怎样的人生观。胡适在其著名的《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曾把易卜生的人生观概括为“写实主义”和“为我主义”^①;后来,他又将易卜生的人生观阐释为“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②。应该说,胡适的这些阐释对于近现代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我们细读易卜生的书信和演讲,发现他的人生观远非“写实主义”、“为我主义”或“个人主义”所能标明。实在说来,易卜生的人生观虽有“写实主义”、“个人主义”的成分,但也蕴含有“理想主义”和“先锋主义”的因子。他固然特别关注并着力描写了人类社会中形形色色的“黑暗腐败”,但其精神个性的内核,却是永远向着“光明的高处”,向着“朝阳照耀的塔尖”的;而且,他一向有着非常自觉的先锋意识,自述“我的作品属于未来”,坚信“谁最契合未来的发展趋势,谁就是对的”,其整个生命活动(尤其是创作活动)更多的是属于未来的。可以说,理想主义、先锋主义^③是易卜生人生观中更具有根本意义的内核。在1887年9月24日的一次演讲中,易卜生

① 胡适说:“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他主张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见《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88—389页。

② 关于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胡适的解释是:“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铎曼医生。”见《胡适经典文存》,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1页。

③ 正如胡适用“写实主义”一词指谓易卜生的人生观,这里的“先锋主义”也是一种人生观——主张人生在世应力求走在时代的前列,作为某一领域的先锋者不断探索,创造出属于未来或对今人后人均有意义之业绩的人生观。

说：“我相信，自然科学中的进化论也同样适合于生命的精神方面。……有人在不同场合多次说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好吧，在一定意义上我是悲观主义者，因为我不相信人类种种理想的永恒性。但我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我坚定地相信人类种种理想的增长与发展能力。”这话对于我们破除误解、走进真实的易卜生提供了一把钥匙。人们往往根据易卜生的现实主义作品认定他是一个写实主义者、悲观主义者，但这只是看到了表象；事实上，基于“进化论”信念，易卜生在骨子里乃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即使是他的“悲观”，也是他心性中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使然。1871年2月17日易卜生写信给乔治·勃兰兑斯说：“我认为，为自由而战其实应该是一种永不停息的追求以及对真正自由概念的探求。把自由当成是某种确定的东西去占有的人，那么当他获得了自由，也就同时失去了自由的灵魂；因为自由这个概念的精髓就在于它能在人们持之以恒的追求过程中成为他们自身的一部分，并且仍然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任何人在这个斗争中停下来，说‘现在我拥有自由了’，那就表明他已经失去了自由。”这番话虽是谈“自由”，但无疑透露出易卜生永不满足、不断进取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与其说是现实主义的，不如说是高度理想主义的。而这种理想主义使他在心智上明显倾向于一种“先锋主义”。在1882年1月3日致乔治·勃兰兑斯的信中，易卜生说：“我必须说，少数派总是正确的。当然，我所说的‘少数派’指的不是落在人数庞大的自由党后面的保守派，而是在前面担任先锋而为多数人远远不能赶上的‘少数人’。”这表明易卜生在心智上倾向于“在前面担任先锋”。在1883年6月12日写给勃兰兑斯的信中，易卜生说：“我认为，一个处在知识界前列的先锋战士是不大可能在身边聚集一大群人的。……就我自己来说，我明显感到了（先锋者）

这种不断的进步。在我每写一本书所站过的地方,现已聚集了大批的人群;但我自己早已不在那儿了。我在别的地方,遥遥领先;至少我希望是如此。”这话透露出易卜生是非常自觉地做一个“知识界前列的先锋战士”的。^①

易卜生以理想主义、先锋主义为内核的人生观,跟他迥异时流的世界历史观、社会发展观是紧密融合在一起的,或者说二者是互相生发、互为因果的。1871年9月24日他在给乔治·勃兰克斯的信中说:“整个人类都走上了错误的轨道。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真有什么东西是站得住脚、无懈可击的吗?具有无可企及的理想?人类的全部历史令我想到一个年轻的补鞋匠,他没有坚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而是跑到舞台上表演起来了。我们无论是扮演英雄还是扮演美人,全都演砸了。”此外,他还多次谈到“迄今所有的发展都不过是从一个错误跌入另一个错误而已”、“人类的发展从一开始就脱离了正确的轨道”等观点^②。这些观点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易卜生所提倡的“整体革命”、“全有或全无”等思想;多年来,我们也将这些思想视为“易卜生主义”的要义。但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易卜生为什么要坚持这些思想观点呢?在他看来人类要怎样发展才能进入正确的轨道呢?若结合他在书信演讲中的其他话语仔细寻绎,我们会发现其思想高度确实

① 易卜生的自我身份意识,或者说他心目中的自我意象,除了“诗人”、“剧作家”,就是“先锋者”、“战士”。1882年1月24日他致信奥拉夫·斯卡乌兰说:“我完全按我自己的意志行事,就像一个孤独的神枪手站在前沿阵地,独自行动,独自负责。”到了70多岁的时候,他还曾对莫里兹·普罗佐尔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想我不会告别那个熟悉的老战场。不过,如果我在那里再次出现的话,我会披上新的铠甲、带上新的武器上场。”见易卜生1900年3月6日致普罗佐尔信。

② 参见1872年4月4日易卜生致乔治·勃兰克斯的信和1897年夏易卜生致米莱夫斯基伯爵的信。

令人惊叹。在1887年9月24日的一次演讲中,易卜生说:“当前时代的政治与社会概念要不了多久会终止存在,而新时代的政治与社会概念将发展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一整体自身将包含着人类幸福的种种条件。我相信,诗歌、哲学和宗教将融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新的范畴,形成一种新的生命力,对此我们当代人还缺乏明确的概念。”联系到易卜生一向反对比昂松等人的“民族主义”,坚信“这个世界不会朝着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方向发展”,可以推断:易卜生认为当前时代各个民族以邻为敌、互相对峙的状况是糟糕的,其背后的“政治与社会概念”是错误的,容易导致民族孤立或民族之间的冲突与战争;而正确的道路是走向一个“统一的整体”,走向全人类的共通与共存。在这过程中,诗歌、哲学、宗教将融合成一个新的范畴,形成一种新的生命力——以审美共通感、知性共通感和灵性共通感团结全人类的心灵,走向他所向往的“第三境界”^①。而走向“统一的整体”,实现“第三境界”,不能依靠“民族主义”,而恰好需要着眼于个体,“唤醒尽可能多的人去实现自由独立的人格”,“让意愿和精神上的亲属关系成为团结的唯一要素”^②。易卜生坚持认为:“诗人的使命不是为国家的自由与独立负责,而是唤醒尽可能多的人去实现自由独立的人格”。只有每一个人具备了自由独立的人格,全人类的共通与和谐才会成为可能。这与马克思所说的“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契合的;因此毫不奇怪,易卜生在1890年8月18日写给汉斯·赖恩·布莱克斯特德的信中

① 1887年9月24日易卜生在斯德哥尔摩一个宴会上说:“我相信我们时代的理想——尽管已经崩溃瓦解——将朝着我在《皇帝与加利利人》一剧所指明的‘第三境界’发展。”

② 参见1871年2月17日易卜生致勃兰克斯的信。在某种意义上,易卜生是彻底“以人为本”的;他也看重“团结”、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但反对以“民族主义”号召人,而坚持通过“唤醒尽可能多的人去实现自由独立的人格”来促成统一体的产生。